

南开史学家论丛

王晓德◎著

美国对外关系史散论

阮曾题



中华书局

南开史学家论丛

王晓德◎著

美國對外關係史散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对外关系史散论/王晓德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南开史学家论丛. 第3辑)

ISBN 978 - 7 - 101 - 05448 - 4

I. 美… II. 王… III. 对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美国 IV. 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556 号

书 名	美国对外关系史散论
著 者	王晓德
丛 书 名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三辑)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1 1/8 插页 3 字数 6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48 - 4/K · 2448
定 价	44.00 元

南开史学家论丛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敦书 白志良 冯尔康 刘泽华 范 曾
李治安 李剑鸣 陈振江 陈志强 张国刚

主 编 刘泽华

副主编 李治安(常务) 陈志强

总 序

南开历史系创建于1923年,但前三十年历史系在南开是蕞尔小科,有时只有一两人维系,不绝若缕。进入50年代开始了迅速发展,到今天已发展为南开的“四大支柱”学科(化学、数学、经济、历史,这是校方的提法),也是全国的史学重镇。这一变化的标志要从1987年全国评定重点学科说起。那年首次评定重点学科,南开全校共获得12个,而不足百人的历史系竟有三个。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名声大噪,人们刮目相待。一些人评论:历史系向来不显山不显水,原来水有潜龙,山有卧虎!近几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比中,南开历史学科居全国第二位,与北大相邻。重点学科重评后依然保持三个,其中中国古代史竟跃居首位。这一势态无疑为同行瞩目。出现这样局面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大局和小局因素等等。大局是共同的,这里省略,只说小局,而且主要说1987年以前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既无“天时”之利,也无“地利”之便,剩下的只有“人和”一项。孟子说的“人和”就是称意的“人治”。就南开历史系以往的发展史而言,也只能从“人治”的角度去分析。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的有效发展。从制度上难于找到成因,而历史系又是著名的穷系,别的不说,一个教研室都分不到一间办公室,有一个时期系主任都没有一间办公室。因此“人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多次说过,历史系有今日之显赫,我们不要忘记学术带头人,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这几位先生也多次跌宕起伏,但他们四位一直居于系领导中心。郑天挺、吴廷璆是党外的

民主人士(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共),杨生茂、魏宏运先生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杨生茂、郑天挺、吴廷璆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到文革后期和80年代前期则继任系主任。他们之间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奇遇,配合的也很默契,像个“不倒翁”,在外力的冲击下不免左右摇摆,但他们有一个重心是不变的,这就是他们实行的“中左路线”。所谓“中左路线”,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跟而不紧”,不搞新花样,近似庄子的“应帝王”;二是有机会就抓业务。郑天挺先生、雷海宗先生、吴廷璆先生是专家,不用多说,他们在业务上起着样板和指导作用。但他们的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安排。因此杨生茂和魏宏运无疑就成为关键人物。杨生茂先生已年届人瑞,而他从来就是一团瑞气:忠厚、虔诚、精深、宽容、执着集于一身。他至今依然是一位执着的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要求一统;凡事以身作则,但不要求“达人”;学术上孜孜以求,执牛耳于一方,但决不傲人,对同事和后进一贯尊重有加。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杨生茂曾是我的领导(在一起编写教材),他从来不会说让我们如何办,但我们都听从他的,他是靠身体力行来领导的!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相当多元化,但对杨生茂先生的人品与学品几乎无不翘首致敬。魏先生作为“党代表”更是处在风头浪尖。在那个“左”的时期,他也不能全离开“左”,但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他一定是“偏右”的,并依靠专家推进教学与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几位先生狠抓教材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学术事业,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的几本中国古代断代史相继出版,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也交出版社,后因被划为“右派”而终止。其他先生也都有相应的讲义印发给同学。师辈们的努力为南开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风云突变,一场急风暴雨也席卷南开,雷海宗被康生点名定为大右派。说起来有点蹊跷,这位大“右派”摘帽很早。随后又给他配备了助手,进行专业“抢救”,1961年又被请上了讲台。魏宏运先生在这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志玖先生因为雷先生辩护遭到大报署名文章的

批判,如果在其他单位难逃“右派”的厄运,但由于魏先生再三说服有关人员,使杨先生免遭一劫。杨志玖先生多次同我说起,没有魏先生的庇护,后果不堪设想,别的不说,一家七口(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夫人为家庭主妇)不知如何生活下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玉哲先生一向不问政治,不知从那来了一股激情,在讲授中国上古史时竟兴致勃勃地宣扬铁托在普拉的演说,这不能不招来批判。由于杨志玖先生得到庇护,王先生也就较平稳地过了关。如果真的把杨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划为“右派”,我敢说,南开中国古代史后来就不可能被评为重点学科。另外还有几位颇有才学的先生,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原单位都视为“包袱”,魏先生和杨生茂先生竟请来在历史系安家落户。那个时期不少系揪出过这种“集团”,那种“俱乐部”,相比之下,历史系却风平浪低。魏宏运先生、杨生茂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年轻人:有时间多读书!魏先生常以郑先生为例说,郑先生白天忙于公务不能读书(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夜间、假日要补回来,要向郑先生学习。新一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魏先生还热情地要青年向沈元学习(沈元,一位学历史的少年“右派”,在家励志苦读,写出了出色的学术文章)。这个班子还商定,要每个青年教师订出进修计划,并指定导师负责,定期检查和汇报,有点像现在的在职研究生。凡此种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革命者”都要批魏先生的“右”。1959年差一点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处于半倒状态,被“挂起来”。“文革”乍起即把魏先生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这无疑是很合乎当时的政治逻辑的。但在历史系一群中,魏先生的革命资历比较长,又没有“历史问题”,出身“贫农”,他的言行多半属于重业务、依靠专家之类,也说不上什么大的政治问题,即使一时被打倒,到落实政策时又能勉强站起来。“文革”中期结合干部时,还只能是他,并且继任系主任。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痼疾”依旧,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大家编写教材,把多数人又引入“业务”之中,成就了“文革”后的一批教授。

在这篇序中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是要说明,没有郑天挺、吴廷璆、

杨生茂、魏宏运几位组合成的“中左路线”，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就没有学术气氛，就难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梯队，我也敢断言，也不会有三个重点学科的降临。有人说，还是“左”了一点，或许是这样。但有一个事实：魏先生几次是因“右”而倒台。再“右”一点会如何，谁来“右”？有道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对评定重点学科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论，但我认为这总是一个重要的整体性学术水平标志，南开历史学科一下子能有三个重点学科真是不容易呀！有了重点学科为南开历史学科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因为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向重点学科倾斜，其后这个“项目”、那个“工程”以及什么“基地”、“中心”等等，都与有否重点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自从有了重点学科，南开历史学科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科研与教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我在这里说重点学科也有另一层意思，它与“南开史学家论丛”人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辑收入的作者都是我们的师辈，多数又是首次申请重点学科的带头人。这里要说明一点，吴廷璆先生无疑是“第一辑”中的首选。但当具体编辑时，得知吴先生的文集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再选入本论丛，就会发生版权冲突，无奈，只能暂付阙如。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收入。

编辑第二辑时，人选难于确定，进退维谷。多种因素制约又不能敞开编选，于是找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在难于处理的地方，以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为限。

第三辑入选者对象是新一代学者。这一代人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都得益于重点学科提供的条件。这一代人才济济，我没有能力一一准确评价和排座位，于是采取了更简化的办法，凡在新一轮重点学科申请中任学术带头人的都收入。这就是本编的六位同志。这个办法易于操作，但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遗憾。只能留到以后再弥补。这次编辑的原则与前两辑也有所不同，这次要求每个人拿出专题

性代表作,只要看本辑的书名就可一目了然。每个人的专长与简况在卷首作者简介中已有交代,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十位作者中,王永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在此谨表沉痛的哀念!

还有几位同志从南开“分身”到其他大学任教(他们还在南开兼职),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南开历史学科培养和成长出了出色的学者,成为“争抢”的对象,是南开的骄傲;惧者,南开流失了人才!天耶?地耶?人耶?令人叹息!南开历史学院是有情的,人虽走,茶不凉,对他们的离开,我们不免怅然,但他们为南开作出的贡献我们将永志不忘,本论丛以收入他们的著作为荣。南开永远是他们的家!

最后我要说几句我的学长范曾先生。孔子说“依於仁,游於艺”,用于范曾最为恰当。范曾靠一支妙笔画尽风流、尽述情怀,天下谁人不知?!这里我仅说几句他对母校的返哺:他创建了东方艺术系,开拓了艺术史的研究,教书育人呕心沥血;这些年来的捐赠逾千万,其中仅历史系就有数百万之巨,其中有对恩师的孝敬,有对后学的奖掖,捐建了“范伯子学术基金”,长期支持对学术研究。“仁者,爱人”,范曾,仁哉、仁哉!

是为序。

刘泽华

2006年11月

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自序

我1956年2月出生在山西临汾地区西山的一个小县城,1975年高中毕业后,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洪流,来到本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从到农村的那天起,我就想大概真要在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还有上大学的机会。我这种“自知之明”主要与我的“黑”政治背景有关。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末在山西牺盟会所办的抗日民族大学毕业,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他与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决死纵队”,但前往报到时路遇当时阎锡山政府的第九专署专员,正好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与他甚熟,经该专员劝说,父亲一行人转而随他回到临汾。据父亲回忆,他当时的想法是,在哪里都是抗日,离家近一点还可以照顾在农村的父母。父亲的“仕途”还算比较顺利,临汾解放时已经成了前政权行署一级的官员。在解放后以“出身论英雄”的年代,父亲“严重”的历史问题对子女前途甚至对职业选择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哥1963年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优异,自以为可以考上清华北大,但却从未中榜。二哥幼时享有“小神童”之称,考初中时分数为全县第一,但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未被录取,为此二哥数日不思茶饭。父亲的“问题”使子女在政治上长期被划为“另类”,心灵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小县城找个工作的可能性都不大,岂敢奢望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实在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我能跨入大学之门更是家人从来都不曾想到的。

我与“历史学”结下终生之缘,并非兴趣所至,纯属偶然。在初高中期间,我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1977年底参加高考时,我本想报考理科,但当时竟连一本数理化的书都找不到,中学时所学的那点理科知识

早在脑海中荡然无存了,再加上根本无时间复习,无奈之下只好转报文科。考试结果出来后,成绩还算理想,当年我县参加文科的考生大概400人左右,仅我一人被录取。预选成绩公布后,我想报考财经院校,但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母亲看来,这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多从事与钱打交道的“会计”或“出纳”等工作,出身“黑五类”者从根子上就有贪污之嫌。以此推断,此类专业政治审查要求严格,我恐怕难过此关。教师地位在当时社会上比较低下,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本来就属于“黑五类”的人似乎只有当教师才适合他们。在我县高中,很多老师都是从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下放来的“右派”。因此,相比之下,师范院校政审或许比较宽松,录取的可能性更大。其实,母亲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离开农村,干什么都行,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第一志愿报考了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侥幸录取。说“侥幸”真还有一段插曲。据当时临汾地区负责招生工作的人日后透露,与我情况大致相同的考生,政审一栏中最初都添上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的意见,地区教育局出于与其他地区竞争录取名额的考虑,出面严厉干预,才迫使县有关部门取消了这一在今天看来几近荒唐的意见。我差一点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与大学擦肩而过。不过,即使当年未被录取,我会选择理科继续再考,而且极有可能像我那些未被录取的同学一样在1978年下半年的高考中以较高的分数被外省大学录取。如果那样,我人生的道路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常常对学生讲,在人的一生中,影响发展前途的关键性机遇大概不会太多,如果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住这些机遇,人生的道路可能就比较顺利,而且会有所成就。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程,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不过,在人生的几次大的转折中我都不是积极主动,常常是在客观环境的逼迫下被动地去做。大学毕业后,只想继承父业,回到我县中学做一名普通的教师。我县地处山区,属于艰苦之地,大学生分配名额没有指标限制。没想到我们那一届执行二级分配原则,即毕业生首先需分配回地区,然后由地区教育局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再次分配。

按照条件,我根本不可能分回临汾,自然也就谈不上回本县了。当时我心急如焚,尤其担心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其他山区小县任教。无奈之下选择了竞争比较激烈的留校,经过专业课考试我以较好的成绩留在了本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任助教。对于未能回老家工作,自己很长时间内耿耿于怀,但能够留校也算在遗憾中找到了一丝安慰。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实际上抓住了对我以后事业发展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机遇。

留校工作后,自己丝毫没有考研究生的打算。那时似乎没有多大压力,除了读书上课之外,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几个好友几乎每天相聚,看电影、逛书店、聊大天成了“家常便饭”。巨平兄(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与我每每谈及这段往事,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那是我们在年轻时度过的最值得留恋的一段美好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年轻教师必须有硕士以上的文凭,否则将强行转岗。我自知除当教师之外不擅长其他工作,对行政管理尤其一窍不通。在这种局势下,为了能够有资格继续任教,我参加了1985年的研究生考试,被湖北大学世界史专业录取,师从拉美史专家黄邦和先生。黄先生解放前为江南著名记者,思路清晰,文笔极佳,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做学问和写文章的最基本知识,也在他的指导下发表了几篇习作。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回到了已经由山西师院更名为山西师大的历史系,继续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室任教。到了此时,尽管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但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我对下一步如何发展并无任何打算,只想做一名好的“教书匠”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产生这样的想法首先与自己“不思进取”有很大关系。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说明。1987年6月,我携妻儿到南开大学拜师访友。黄邦和先生事先知我要去南开,便嘱我到南开后一定要拜访两人,一是在美国史研究上很有声望的杨生茂先生,二是国内拉美史中年学者洪国起先生,并给二位先生各写了一封引荐信。到南开大学后,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将来大概也不会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思忖良久,我便决定放弃与这两位我心中十分

仰慕的学者相识的机会。一天下午,杨生茂先生到主楼旁小平房的历史研究所收发室取信,正巧我与先生相遇。当时陪同我的是正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巨平兄,他建议我趁此机会拜见先生,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唐突,犹豫再三而止,只是充满敬意地目送着先生的背影渐渐远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我与这两位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到南开大学师从杨生茂先生攻读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回到山西师大任教,在很多人眼中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生活也过得比较安逸。除了上课之外,搞科研没有条件,只好用打牌下棋甚至找几个人凑在一起玩麻将打发无聊的业余时间,真是有点“玩物丧志”的味道。我爱人不希望我消沉下去,便力劝我尝试考取博士生。其实,我个人也有此意。在省属高校任教,拥有硕士学位尽管已可立足,但并无很强的优势。如果博士学位加身,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且会使生活待遇明显改善。不过,为此也需付出很高的代价。利弊相权,显然利远远大于弊。用一句不恰当的话来说,牺牲几年的时间却可换回终生的享用。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很幼稚可笑,功利性太强,但的确是我决定考博士生的主要动力。当时招收世界史博士生的学校不多,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在国内力量最强,杨生茂先生的学问人品、道德文章,令我等晚辈早就向往。当我决定报考杨先生的博士生后,回想几年前失去与杨先生谋面的机会,真是令我懊悔不已。杨先生选择弟子极为严格,甚至到了几近苛刻之地步,报考者多被劝说另择他处,以免受到耽误。到我报考时,杨先生已有五年没有招学生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报考前给杨先生写了一封信,先生正好生病住院,不知何因,没有接到这封信,我侥幸取得了参加笔试的资格,最终如愿投到先生门下,成为先生的第二个博士生,实现了人生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四年前我儿子考上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之后,我把首功归于先生,特地带上儿子到先生处表示谢意,先生为此还很感动了一番。

杨先生非常和善,但在做学问上对学生要求很严。先生经过长期摸索有自己一套培养博士生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博士生要具备扎实的学识基础与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博”的基础上求“约”。他开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专业书目让我分阶段阅读,然后隔周到先生家里讨论。杨先生虽不擅言谈,但每次聆听他的教诲都感到收益很大。日积月累,自己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杨先生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以及他长期在研究中形成的方法对我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先生的循循善诱,才使我一步步地迈进了神圣的学术殿堂。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外交史尽管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但那时获取资料的条件实在有限,与现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中国,资料匮乏是治外国历史者所无法逾越的一道巨大障碍,无资料,犹如“无米之炊”。治美国外交史即使有了资料,还存在一个鉴别含义的问题。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外交辞令和官样文章往往掩盖了外交决策的利益考虑与深层动机。因此,研究者必须具有透析、驾驭原始资料的慧眼与极强的能力,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否则易陷于面对资料无所适从的困境。上述想法是我从杨先生那里获得的主要体会之一,也是我把博士论文确定为对威尔逊外交研究的基本原因。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一选题的丰富资料,特别是53卷的《威尔逊文件集》能够使我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档案。论文选题确定之后,杨先生让我首先做三件事,一是摸清国内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外文论著收藏情况,并举出其中重要论著的基本观点,为此我花费了数月时间,写了近三万字的“关于威尔逊外交论著的观点摘要”;二是分专题写一篇美国学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状况的综述;三是在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威尔逊外交研究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提交一篇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学术论文。我在杨先生的指导下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几件事,先生还比较满意,论文和综述分别发表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上。随后我就开始阅读关于威尔逊外交的原始档案资料,每天泡在图书馆,早出晚归,边

看边翻译,最后统计字数竟有数十万之多。正是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思考,我对威尔逊外交有了新的认识,最终完成了题为《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的论文。全文近27万字,首先从文化角度揭示了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历史起源,然后剖析了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美国现实的认识,接着就以美国这种独特的外交方式为经,以威尔逊的外交行为为纬,比较全面地展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推行与产生的结果。论文的结论是:威尔逊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任总统八年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问题,打着实现美国传统“理想”的旗帜,加速了美国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扩张。威尔逊的外交活动为理解当代美国外交的实质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学术著作出版极难的情况之下,这篇博士论文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被选进了在学术界享誉很高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据负责该文库的编辑后来说,当年申报的博士论文有80余篇,仅有2篇入选。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一些同仁的好评,先后获得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一等奖和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再次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毕业后是回原学校,还是另择更适合自己学术事业发展的学术机构。最初的构想是前者,但在南开大学的严格学术训练已经激发起我从事科研的兴趣,同时感到自己具备了这方面的基本素质。如果从生活上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山西,既可以不需要太多的奋斗就能过上体面安逸的生活,还能够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山西师大校长也给我来信,以在当时看来比较优厚的条件希望我毕业后回去。他还专派校人事处长来南开与我商谈回去的具体事宜。回原学校的诱惑力尽管很大,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洪国起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留在南开大学的机会。我对洪老师早有耳闻,黄邦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经常提及洪老师的学问与人品,非常令我钦佩。来到南开大学后我

几次想登门拜访,但洪老师当时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我怕见生人,见校领导时更是惶恐不安。因此,拜访洪老师的念头一出现,便很快就被打消。1991年11月,洪老师去大连参加纪念哥伦布的学术讨论会,我有幸与他同船前往,直到此时我才与洪老师相识。我对洪老师的最初印象是:待人和善,一点没有校领导的架子,谈起话来逻辑性很强,而且在吃饭起居上对同船的几个人关心备至。这种印象数年后都难以忘怀。这次会议后没有多久,国家教委开始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准备在南开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以协调全国高校的拉美问题研究。洪老师作为全国高校拉美研究协调小组组长负责此事。大概是到了1992年的后半学期,在国家教委的敦促之下,这件事被提上了学校的议事日程。此时离我毕业只剩下半年时间,洪老师希望我能留在南开,协助他借这次国家教委加强国际问题研究之机重振南开拉美研究之大业。我当时虽未立刻答应,但已心动,开始参与成立拉美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我也与亲朋好友协商我毕业后的去留问题,多数人主张我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毕竟南开大学是全国知名学府,天津是三大直辖市之一,艰苦生活只是暂时的。这一次,“事业心”在我的毕业去向选择上占了上风,经过反复的权衡,我最终决定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明智的决定实际上翻开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一页。

毕业留校后,1993年下半年妻儿就随同我一起来到南开,一家人居斗室一间,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不过,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因此我并没有产生任何后悔之意。当时拉美研究中心已经成立,学校在原汉语教学楼分配给中心一间办公室,我每天就在那里看书,顺便处理中心的日常事务。在此之前,洪老师与我申请到了国家教委一个关于美国与拉美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当时,我对美拉关系史虽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但早有涉猎,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为“评析门罗主义的不变与改变(1823—1987)”,以门罗主义为主线考察了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演变。在做硕士论文期间,我搜集了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大量论著,并围

绕这一论题发表了多篇论文,还翻译发表了数万字的 20 世纪上半期美拉关系史的资料,刊登在 1986 年的《拉美史研究通讯》上。洪老师一直给研究生开美拉关系史的课,在这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正是原先研究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资料准备实际上早已开始,再加上每天十几个小时的伏案工作,我与洪老师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一课题,结项成果《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1994 年 10 月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全书 34 万字,以冲突与合作为主线考察了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力图把美国政府各个时期对拉美政策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从中揭示出美国对拉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的实质,以把握住美拉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书中尽管不免有取材不当和错误疏漏之处,但毕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从宏观上把握美拉关系总体发展的专著,出版后得到同行的好评,杨生茂先生为此书写了数千字的读后感。该书 1996 年获得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在拉美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工作,理应以研究拉美问题为主攻方向,但我不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有所思考的美国对外关系史这一研究领域,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在很长时期令我颇费脑筋,无奈只好“两条战线作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实际就开始关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深感美国对落后国家的外交具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即以所谓的“理想主义”方式来推行其外交。“理想主义”的含义是美国“受上帝的委托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它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理所当然地应该用美国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和传统,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这种最基本的认识使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把研究重点转向美国文化价值观对外交影响这一课题上。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界和学界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美国靠着其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观打赢了这场战争,反映到政策层面上,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如果说过去美国文化在外交中主要发挥一种潜在作用的话,那么在冷战后却被美国政府决策者有意识